

錢歌川的台灣經驗與原鄉意識*

黃惠禎

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要

1947年3月，錢歌川應聘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抵達台灣，從此在台生活17年。本論文經由錢歌川作品的整理與爬梳，考察錢歌川文學創作的主题，及其在大陸來台作家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同時，藉由所描述進出台灣的始末，定居台灣期間的經歷見聞，了解台灣經驗在錢歌川個人生命史上的意義。研究發現，錢歌川既有遊賞台灣風物之作，也有觀察台灣社會民生的真實紀錄。值得注意的是受國共內戰牽累被迫滯台以來，錢歌川所抒發懷念故土的鄉愁，及所流露關於中華文化式微的焦慮，與反共意識形態全然無關，其中暗藏對於官方文藝政策的消極抵抗。另外，離台之後，錢歌川所指「故國」的意涵，從中國大陸擴及於台灣，以台灣為第二故鄉的認同也逐漸萌發，顯示作家本人在世界地理座標上的移動，連帶影響內心裡的台灣也有位移流動的可能。

關鍵詞：錢歌川、味椒、原鄉、遺民、台灣文學

* 本論文為「移民或遺民：錢歌川文學的臺灣意義」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100-2410-H-239-005。由衷地感謝兩位審查委員與本系邱雅芳助理教授惠賜寶貴意見，筆者已盡可能進行修訂。有關錢歌川與清代以來大陸來台作家的比較，謹作為延伸的專題，日後另闢篇幅加以討論。

Chien Go-chuan's Taiwan Experience and Homeland Consciousness

Huang Hui-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Abstract

In March 1947, Chien Go-chuan arrived in Taiwan for the job offer of the Dean's position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t Taiwan University, and he had lived in Taiwan for seventeen years ever since then. This paper aims to reorganize and study Chien's work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is theme of literary creation as well as the generality and specialty of his works among China writers. Besides, the paper also attempts to discover how Chien's Taiwan experience links to his life history by studying the way he described the whole story of his moving to and out of Taiwan and his living experience in Taiwan. The study shows that Chien had not only written travel notes about Taiwan's folk and scenery, but also had archived his observations about people's livelihood in Taiwa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ince he was forced to stay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Chien's creation about expressing his homesickness and concerning for the desc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d not been related to anti-communism at all. Instead, Chien had shown passive resistance to official literary and art policy by implication. Finally, the paper finds that after Chien left Taiwan, what he meant by "homeland" in his works was no longer Mainland China exclusively, but included Taiwan as well. This change suggests that Chien's acknowledgement of considering Taiwan as his second homeland was growing, and shows that when the writer's body moved around the world, the position of Taiwan in his mind could be changed.

Keywords: Chien Go-chuan, Weigan, Homeland, Loyalist, Taiwan Literature

錢歌川的台灣經驗與原鄉意識

一、前言

1947年3月，二二八事件爆發不久，錢歌川（1903-1990）應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聘約來到台灣。由於1933年起曾擔任上海《新中華》半月刊編輯，與林語堂、郁達夫、成仿吾、施蛰存、馮乃超、豐子愷等知名作家時有往來，¹ 1934年至1944年間，又在上海與重慶先後出版過《北平夜話》、《詹詹集》、《流外集》、《觀海集》、《偷閒絮語》、《巴山隨筆》六本創作集，² 入台時錢歌川已是文化界享有盛名的作家。抵達台灣前的3月1日，《臺灣之聲》「歌唱指導歌曲」率先刊登了由錢歌川翻譯歌詞，敘述萊茵河女妖傳說的德國歌謠〈羅勒萊的歌〉。³ 來台後，錢歌川的寫作生涯隨即在台展開，《臺灣文化》、《臺灣新生報》、《公論報》等報刊都看得到他發表的創作。

1949年2月，為促進旅行事業開展與招攬大陸觀光客而創辦的《臺旅月刊》，從創刊號起刊登了多篇錢歌川的散文作品。⁴ 1949年5月14日，在國共內戰的推移之下，台灣成為最重要的一個基地，上海的《新希望週刊》特別加重台灣的份量，錢歌川立即受邀發表在台生活的隨筆，並有多篇作品陸續刊出。⁵ 1949年9月3日，錢歌川應黃純青、李翼中的聯名邀約，出席薇閣詩社在

1 往來密切的作家中，成仿吾與馮乃超是錢歌川留學日本東京時即已熟識，豐子愷則是錢歌川初到上海不久時，透過東京高等師範的同學介紹而認識，豐子愷並引領錢歌川走向出版界與文學之路。參見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香港：香江出版社，1986.12），頁62-66；錢歌川，〈追憶豐子愷〉，《錢歌川散文集——瀛壖消閒錄》（台北：四季出版事業公司，1981.10），頁297-301；錢歌川，〈回憶郁達夫〉，《雲容水態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6.12），頁126-127。

2 這六本文集中的《北平夜話》、《詹詹集》、《流外集》、《觀海集》由上海的中華書局於1934至1937年陸續出版；抗戰時期中華書局遷至重慶，《偷閒絮語》和《巴山隨筆》由重慶的中華書局於1943年、1944年分別出版。

3 〈羅勒萊的歌〉，由Friedrich Silcher作曲，附有樂譜，刊於《臺灣之聲》民國36年三月號（1947.03），頁12-13。

4 錢歌川在《臺旅月刊》發表的作品，有用「味橄」筆名發表的〈談「無所謂」〉、〈月夜觀曇花記〉，以及用錢歌川之名發表的〈開羅之遊〉、〈初訪拿波里〉。

5 依筆者所知，《新希望週刊》台灣版刊出的錢歌川作品，以「味橄」筆名發表者有〈旅臺漫筆（一）〉、〈大三元——現階段的教授生活〉、〈鄭成功是怎樣成功的？〉、〈蚊蚋的樂園〉、〈吸煙的故事〉、〈戰敗四年後的日本〉、〈南臺雙泉試浴記〉，另有以錢歌川之名發表的〈日月潭探幽〉。

圓山飯店舉行的聯吟大會，與林獻堂等省內外各界知名人士同場切磋。⁶從雜誌社與詩社的紛紛主動邀稿，⁷即可窺知當時錢歌川在文壇的聲望。

另外，1948年3月底，《臺灣新生報》「橋」副刊爆發台灣新文學重建論爭，省內外作家歷時數個月熱烈討論台灣文學路向之際，錢歌川於1948年5月13日在《中華日報》「海風」副刊發表〈如何促進臺灣的文運〉，建議台灣作家利用本省的故事，寫出本省人的性格，寫出有地方色彩的鄉土藝術，隨即引發本省與外省來台作家的相繼回應，連帶使得論戰延伸至「海風」副刊。其間並有「橋」副刊主編歌雷（史習枚）在「編者·作者·讀者」欄公開邀請錢歌川，參與主題為「總論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第九次作者茶會。⁸由此不難想見，錢歌川活躍於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文化界的情況。

總計錢歌川一生出版過22本散文創作，另有自傳與古典詩集各一冊，其中至少有十種初版於台灣，在其他地區初版但曾在台重刊者有四種。⁹其中，1948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游絲集》，收錄了〈入臺記〉、〈臺灣初旅〉、

6 這次的詩酒之會，以〈秋夜宴劍潭山〉為題拈韻，錢歌川有〈附庸風雅記〉記述收到請柬到赴約作詩的過程。另外，黃得時編《板橋詩苑別集》（台北：薇閣詩社，1949.12），除收錄當天各家詩作，以及薇閣詩社社長黃純青〈薇閣詩社緣起〉、林熊祥〈秋夜宴劍潭山詩序〉兩篇文章外，另有依交卷先後為序的〈作者題名錄〉。從這份名錄來看，與會者包括本省籍的林獻堂、陳逢源、謝汝銓、黃得時、辜振甫，以及外省籍的張默君、曾今可、陶芸樓、陳含光、易君左……等四十多人。

7 《臺旅月刊》創刊號〈作者介紹〉處特別說明：「『談「無所謂」』是前臺大文學院錢歌川教授，在忙中，撥冗為本刊撰寫的隨筆。錢氏在文學界的地位及其對文藝修養和創作，都不必介紹，下期他將為本刊撰寫國內外遊記，錢氏在東洋和歐洲都有過長期的羈留，書篋的豐滿，是每個讀者所稔知的，大家等着下期的佳作」。《新希望週刊》12期在〈編後語〉曰：「在上海的朋友們有些星散了，而因戰爭的推移，臺灣已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基地，我們老早就想出臺灣版的，於是，首先約好了在臺灣的一些好朋友開始寫文，在第十二期即加重了臺灣的份兩（按：「量」之誤），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十二期以後，自然更加向這方向努力以赴。在本期首先為本刊執筆亦是為老朋友幫忙的有味橄先生，他就是名作家錢歌川。味橄的筆名大概不會生疎，他任臺大文學院長，而抽餘暇為本刊寫文，陸續刊出，是本刊十一期以後的一大特色。」以上分別見於編者，〈作者介紹〉，《臺旅月刊》創刊號（1949.02），頁47；不著撰人，〈編後語〉，《新希望週刊》12期（1949.05.14），頁15。

8 歌雷，〈總論臺灣新文學運動〉，《臺灣新生報·橋》129期「編者·作者·讀者」欄，1948.06.21。

9 這24本中，確定初版於台灣的十種為：《淡煙疏雨集》、《三臺遊賞錄》、《竹頭木屑集》、《狂醫集》、《搔癢的樂趣》、《罕可集》、《秋風吹夢錄》、《客邊瑣話》、《籬下筆談》、《錢歌川散文集——瀛壖消閒錄》；其他地區初版但曾經在台灣重刊的四種為：《北平夜話》、《偷閒絮語》、《游絲集》與《蟲燈纏夢錄》；從未在台出版的九種為：《詹詹集》、《流外集》、《觀海集》、《巴山隨筆》、《浪迹烟波路——錢歌川雜文集》、《楚雲滄海集》、《苦瓜散人自傳》、《雲容水態集》、《浮光掠影集》；古典詩集《湖山入興樓詩》則是出版地不詳的非賣品。其中，《浮光掠影集》僅見收於《錢歌川文集》第四卷，是否未及以單行本正式出版，尚待查考。另外，以上在台灣出版作品集的計算方式，不包含台灣初版又在台灣再版者。至於曾經在中國出版的多種選集，包括《錢歌川文集》四卷、《錢歌川散文選集》、《錢歌川散文》上、下集、《錢歌川代表作·巴山夜雨》等，由於是已出版文集的綜合再編選，不在計算之列。

〈臺灣的國語運動〉、〈燈籠〉與〈談小品文〉五篇曾在台灣發表的新作；1943年抗戰期間在重慶中華書局出版的《偷閒絮語》，1973年於台北的大林出版社重印時，加入了與台灣相關的〈入臺記〉、〈臺灣初旅〉與〈臺灣的國語運動〉三篇文章，使得錢歌川在兩岸的文學寫作銜接了起來，這兩本初版於中國的書也因而有了台灣的在地性意義。

從前述的資料來看，錢歌川遷台之後仍筆耕不輟，不僅作品之書寫與出版多在台灣，即使離開台灣，作品之發表仍以台灣的報刊為主，無疑是一位擁有眾多台灣讀者的重要作家。然而由於著作種類繁多，除了文學創作之外，兼有日文語法和英語發音、文法等教學用書，尤其譯作之多與翻譯理論專著的廣為流傳，¹⁰ 做為「翻譯名家」的錢歌川，似乎較「文學作家」的身分更為人所熟知。¹¹ 1985年，學者李豐楙為《中國現代散文選析》撰寫的〈緒論〉中，將錢歌川列為跨越1949年的散文代表作家之一。¹² 1997年起「中國現代文學館」出面組織《中國現代文學百家》編委會，針對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三十年間的文學，編纂「中國現代文學百家」代表作叢書，錢歌川亦在入選的108位作者之列。¹³ 可見他在現代文學創作上的歷史地位，已獲得中國現代文學史家的認可。可惜錢歌川在台出版的文集已因絕版而難以尋覓，對錢歌川相關研究青睞者亦極為少見。

截至目前為止，以錢歌川及其創作為主題者少，且多為一般性的介紹文字。其中，莫渝〈不曾輟筆的錢歌川〉指出錢歌川散文集書名典雅，及書前

10 錢歌川以在新加坡教授翻譯課的講義，整理成《翻譯的技巧》正式出版，意外成為生平第一部暢銷書，甚至在中國銷售五十萬部之多。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頁190。

11 余愛華曾指出，錢歌川「英語學習著作及譯書甚多，比其文學著作更廣為人知。」引自〈錢歌川〉詞條，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辭典資料庫檢索系統」（來源：<http://tld.nmtl.gov.tw/opencms/dictionary/Dictionary01819.html?keywords=%e9%8c%a2%e6%ad%8c%e5%b7%9d>，2014.06.10）。

12 初版於1985年的《中國現代散文選析》是由李豐楙、呂正惠、何寄澎、林明德、劉龍勳、賴芳伶、簡宗梧等七位大學教授合編，以民國38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為界分成兩輯。在第二輯的〈緒論〉中，錢歌川與梁實秋、陳紀濤一同列入跨越1949年的散文作家，並被認為是民國三、四十年代既已有其成就者，以及五十年代台灣的散文代表作家。李豐楙，〈緒論〉，李豐楙等編著，《中國現代散文選析2》（台北：長安出版社，1987.09再版），頁475-487。

13 中國現代文學館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百家」中，《錢歌川代表作·巴山夜雨》由劉慧英負責編選，1999年由北京的華夏出版社發行。筆者手中的是2009年重印版。

有古詩詞當作題辭的特點。¹⁴ 趙志邦〈記錢歌川教授〉¹⁵ 概述錢歌川的重要履歷及文學活動外，亦校勘既有的錯誤記述。殷志鵬〈錢歌川遺詩中的人品因素〉，從錢歌川致作者的書信中整理出七首遺詩，並列舉三首證明錢歌川對故國與豐子愷等故人一往情深。¹⁶ 余愛華所撰〈錢歌川〉詞條，總評錢歌川的創作藝術在於，「文風樸實有味，常在不起眼事物中看出哲理。寫人生經驗記友記事，充滿對故人故土的深情思念；或介紹西洋典故趣聞，談笑中顯示深厚學養」。¹⁷

另有五篇專論錢歌川散文者，全數來自中國學界。杜學忠〈錢歌川散文創作論〉¹⁸ 指明錢歌川不屬左翼又非右翼，既與林語堂保持友誼，肯定林語堂助長了小品文的成就；又與穆木天、馮乃超等左翼作家過從甚密，讚賞他們的普羅文學，這種立場與態度也反映在他的創作題材和風格上。並認為錢歌川三〇年代大部份的散文反應現實、貼近生活，但他對政治少有興味，沒能反映出尖銳的政治鬥爭、階級矛盾，或時代的風雲變幻。另歸納出錢歌川的散文隨筆在藝術上獨到之處有：洋溢著苦澀幽默的風韻、小題大作、善於抓住所寫對象的特徵、樸實典雅且富於音樂美和表現力、行文帶著自傳性的色彩等五點。尤其提示錢歌川自幼受到古典詩詞的浸染之下，文言詞藻與句式有機地融入現代白話，為其散文語言的最大特點。其餘四篇評述所見略同，多側重語言形式上的藝術特色。

陳子善〈錢歌川和他的散文〉評論錢歌川的散文著作，「就數量而言，僅次於周作人，已超過了林語堂和梁實秋」。¹⁹ 田青〈漫談錢歌川的散文〉也肯定錢歌川留下22個散文集，「創作數量之多，創作生命之綿長，這在中國現代

14 莫渝說錢歌川的散文集，「每冊書前均有古詩詞當做題辭」。筆者查閱後發現22本散文集中有12冊，詳如後述。參考莫渝，〈不曾輟筆的錢歌川〉，《文訊》62期（1990.12），頁120-121。

15 趙志邦，〈記錢歌川教授〉，《傳記文學》58卷1期（1991.01），頁59-62。

16 殷志鵬，〈錢歌川遺詩中的人品因素〉，《香港文學》76期「紀念錢歌川先生特輯」（1991.04），頁23-24。

17 引自余愛華，〈錢歌川〉詞條，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辭典資料庫檢索系統」（來源：<http://tld.nmtl.gov.tw/opencms/dictionary/Dictionary01819.html?keywords=%e9%8c%a2%e6%ad%8c%e5%b7%9d>，2014.06.10）。

18 杜學忠，〈錢歌川散文創作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4年01期，頁203-213。

19 陳子善，〈錢歌川和他的散文〉，《書城》1995年04期，頁33。

文學史上都是少見的」，並推崇錢歌川懷舊散文中的離情別緒真實感人。²⁰ 陳嘯〈“偷閒”絮語——錢歌川散文論〉認為錢歌川的散文小品如家常絮語，以閒話的方式寫出自己的心情及與個體生命的連繫。²¹ 至於王嵩〈如嚼橄欖 深有餘味——錢歌川散文風格論〉，堪稱既有研究成果的總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點出錢歌川的部分作品，表現了去國懷鄉的創作母題，以及居美期間在中美兩種文化的比較中，流露出的民族自信與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²² 綜合前述可以發現，歷來有關錢歌川作品內容的論述，雖已提示思鄉情懷與國族認同的兩個面向，然未見針對創作主題有系統性的深入分析。

回顧錢歌川的一生，少時曾在私塾誦讀中國傳統典籍，中學畢業後負笈日本東京學習英國文學，抗戰早期遊學英國倫敦時，順道遊歷義大利、梵諦岡、法國的幾個歷史名城與文藝重鎮，回國參加對日抗戰前前任職於新加坡報界，戰後再以英美文學專家的身分，先後執教於臺灣大學、台南的工學院（後改制為「國立成功大學」）、海軍官校、陸軍官校、高雄醫學院（今之「高雄醫學大學」）等校，在台北與台南住過17年的時光。爾後，陸續移居新加坡與美國，直到過世。

來台前足跡已踏過歐亞數個國家，領略過多種不同文化風情的錢歌川，初抵台灣時，對這個甫結束日本50年殖民統治的島嶼印象如何？當因兩岸分治而被迫定居台灣時，錢歌川的態度與心情如何？戒嚴時期反共文學蓬勃發展之際，錢歌川如何回應這種政治性的文學風潮？離台陸續移居新加坡與美國之後，錢歌川如何看待在台灣生活的一段歲月？置於台灣文學的歷史長河中來看，錢歌川的文學創作有什麼樣的意義？這是前行研究幾乎不曾著墨之處，也是筆者最有興趣探求的幾個問題。

本論文即針對前述各項疑問，以錢歌川居台之後的作品為主，進行整理與爬梳，並透過作品的脈絡化（contextualize），考察錢歌川創作的主題與內容特色，提示它們在大陸來台作家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同時，筆者亦將藉由錢

20 田青，〈淺談錢歌川的散文〉，《語文學刊》1996年06期，頁25。

21 陳嘯，〈“偷閒”絮語——錢歌川散文論〉，《名作欣賞》2012年29期，頁120。

22 王嵩，〈如嚼橄欖 深有餘味——錢歌川散文風格論〉，《閩江學院學報》2014年06期，頁75-77。

歌川所描述進出台灣的始末，定居台灣期間的經歷見聞，了解台灣生活的經驗在他個人生命史上的意義。希望能以錢歌川作為一個抽樣，藉此一窺大陸來台作家的歷史經驗與心情轉折。

二、外來者的見聞錄

關於錢歌川來台的動機，作於1947年8月的〈入臺記〉中，清楚說明主要是因為波茨坦會議之後，確知只要能把日本打敗，台灣確定可以重新收入中國版圖。當時在重慶的留日同學集會時，經常討論到台灣與東北的問題，認為戰後的復員整理，留日同學因有許多便利，應該負有相當的責任。在聽了東北的朋友談了一些東北的情形，和台灣的同學描述台灣的景色之後，錢歌川便心為之動，很想到台灣來做點文化工作。儘管聽聞台灣有文化隔絕的問題，「本地報章雜誌，沒有可以看的，而上海的報紙也要隔幾天才能看到」，令曾因星洲（新加坡）缺乏書報，而無法久住的錢歌川有所考慮，思及「不過臺灣既已光復，沉默了多少年的文運，現在應該重新推動起來」，錢歌川決定不因一時隔絕棄台灣於不顧。²³ 由此可知，具有日本留學經歷的錢歌川，最初是在戰爭結束以前的暫居重慶時期，有志於在戰後從事文化工作的使命感所驅使，油然而興起來台的念頭。

爾後由於派駐日本與行政長官公署是否同意等因素影響下，幾番波折，錢歌川終於在3月間順利來台，迅即於4月間提筆寫下〈臺灣初旅〉，描寫搭船從基隆上岸前後對台灣的第一印象：

在海上遠遠的望見的臺灣，就和長江中的小孤山一樣，一堆翠玉，聳在眼前，等到駛近基隆的時候，仍是青山綠水，樹木陰翳。最初那位葡萄牙人見此而驚奇，稱為美麗之島，我們在三百餘年以後來看，還是和他有同樣的感覺。²⁴

23 錢歌川，〈入臺記〉，原以「味橄」筆名刊於《臺灣文化》2卷6期（1947.09），頁9；收於錢歌川，《偷閒絮語》（台北：仙人掌出版社，1970.11），頁193-194。

24 錢歌川，〈臺灣初旅〉，《偷閒絮語》，頁199。根據篇末「卅六年四月」，本文作於1947年4月。

「美麗之島」原是葡萄牙人用以形容台灣之詞，也被錢歌川用來形容上岸前遠眺青山綠水的驚奇與讚嘆。直到1949年5月發表的〈旅臺漫筆（一）〉，²⁵ 這種最初映入眼簾就是一片濃綠的印象，依然深深地烙印在錢歌川的腦海中。當時的台北市也因為滿布禾苗與樹木，望去青翠欲滴，又有風聲和鳥語在空中漂蕩著，被錢歌川稱為「田園都市」。

第一次入台，錢歌川就很愛好這個地方，不久即把家眷接來同住。作於1947年8月的〈入臺記〉，說明了其中原因：

臺灣的環境這般幽靜，圖書館又有的是書，實在可以令人留戀，我在抗戰期間入蜀，沒有得到好的印象，所以詩句中有「今日我來風景異，巴山無復舊時娟」之歎。現在光復後入臺，對於這個美麗的島嶼，只覺得相見恨晚，在到處干戈擾攘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塊清靜的地方息影讀書尤其難得。就是天下太平的時候，臺灣也不失為一塊樂土。我愛臺灣，雖則經了許多周折，我終於到了臺灣，這是一件可慰的事，所以我在這裏要把入臺的始末記述出來。²⁶

字裡行間洋溢著遷居台灣的興奮之情，也透露出內戰烽火在大陸蔓延之際，生活於清靜如樂土的台灣，有如魚得水般的快適與愜意。

1948年6月起，錢歌川陸續創作描摹台灣物種的作品。〈邨居雜詠〉²⁷ 以七言絕句的形式歌詠芙蓉、曇花、葉下紅、七絃竹、棕櫚五種台灣植物，充分表現初來乍到的旺盛好奇心。另外，〈月夜觀曇花記〉²⁸ 敘述徹夜守候大陸上極為少見的曇花開花，欣賞其美麗的姿態與襲人清香的過程。〈蚊蚋的樂園〉²⁹ 指出台北無法避免蚊蟲侵害嚴重的原因，在於下水溝填滿污穢的死水，適合蚊蟲之孳生與繁殖，並提出市政衛生當局應好好地加以改善的呼籲。〈臺

25 味橄，〈旅臺漫筆（一）〉，《新希望週刊》12期，頁6-7。

26 錢歌川，〈入臺記〉，《偷閒絮語》，頁197。根據文末「三十六年八月」，本篇作於1947年8月。

27 錢歌川，〈邨居雜詠〉，《公論報·日月潭》177期，1948.06.12。

28 味橄，〈月夜觀曇花記〉，《臺旅月刊》1卷6期（1949.09），頁14-15。

29 味橄，〈蚊蚋的樂園〉，《新希望週刊》15期（1949.06.04），頁4。

灣三多〉³⁰則在蚊蟲之外，記述大陸少見的壁虎與蝸牛，並特別註明作為將來紀念旅台歲月之用。前述〈邨居雜詠〉中的「南國溫噉景物奇」，正表現出亞熱帶台灣在錢歌川眼中，與大陸有別的溫暖氣候及所孕生的奇特景物。

來台後的兩年間，由於臺大文學院院長的職務纏身，除了近郊的陽明山與北投溫泉外，錢歌川未曾離開台北市中心一步。擺脫行政職的牽絆之後，錢歌川便隨時準備出遊。³¹從1949年初夏遊覽古都台南的赤嵌城開始，一年多的時間裡，踏過日月潭、阿里山，以及知名溫泉鄉的四重溪、關子嶺、烏來等地，多篇遊記接連發表。³²1953年，包含這幾篇遊記及描述台灣物產、歷史、宗教民俗等的散文作品，收錄於《三臺遊賞錄》出版。³³除了〈威爾斯與臺灣〉因在阿里山的高山博物館，見到評定「阿里山五木」的博物學家威爾斯（H. J. Elwes）之名，誤認為英國大文豪威爾斯（H. G. Wells）之外，³⁴〈兩個日籍的生番〉敘述娶原住民婦女為妻的兩位日本人——近藤勝三郎橫斷中央山脈，以及原為腦丁的渡邊成為原住民部落頭目，再歸順日本殖民政府，爾後任職山地警官的傳奇故事；〈臺灣的媽祖〉探索媽祖的生平事蹟，以及台灣本地媽祖信仰的由來，展現了錢歌川對台灣歷史與宗教民俗的興趣。

另一方面，中華民族主義的思維經常從錢歌川的筆下流瀉而出。例如《三臺遊賞錄》中說明遊歷台南之因，在於「臺南是延平王的故都」，強調安平是鄭成功為紀念起師之地在「收復」後所命名；³⁵到四重溪不忘順道一遊牡丹社事件的石門古戰場，並留下「我們在今日來到四重溪，浴罷蘭湯，不免要緬懷往事，以日本人過去圖謀之切，既得後防範之嚴，但我淪陷半世紀的國土，今

30 根據文後附註，寫於1951年5月26日，最初發表時間與刊物不詳。收於錢歌川，《三臺遊賞錄》（高雄：大眾書局，1953.06），頁61-64。

31 錢歌川，〈赤嵌城遊展〉，《三臺遊賞錄》，頁9。

32 目前遊覽赤嵌城紀錄的〈赤嵌城遊展〉，首次發表時間與刊物不明。其餘各篇發表詳情為：味橄，〈南臺雙泉試浴記〉，《新希望週刊》18期（1949.06.25），頁5-6。錢歌川，〈日月潭探幽〉，《新希望週刊》30期（1949.09.17），頁12-13。錢歌川，〈烏來觀瀑記〉，《暢流》1卷1期（1950.02），頁8-9。錢歌川，〈雨遊阿里山〉，《暢流》1卷11期（1950.07），頁11-12。這五篇收錄於《三臺遊賞錄》時，並未依照遊歷時間或原發表先後順序排列。

33 〈旅臺漫筆（一）〉收入《三臺遊賞錄》時改題為〈芸窗漫筆〉，頁38-41。

34 劉克襄，〈錢歌川的美麗錯誤〉，《印刻文學生活誌》92期（2011.04），頁130-132。

35 錢歌川，〈赤嵌城遊展〉，《三臺遊賞錄》，頁9。

又重光，侵略者真是妄費心機了」，³⁶ 這些文字都顯示作者凝視台灣風物時，無所不在的中國觀點。

再者，初抵台灣時見此地仍留有日本遺風，從大學教授到販夫走卒，「談起來大都是說日本好，中國壞」，把日本貨視為世界第一，錢歌川剖析了這是日本政府的國民教育成功所致，因此而呼籲：

光復後的臺灣，要接收的不是敵產，而應該是人心。如何可以使淪陷五十年的臺胞歸心，就在教育。透過教育，我們可以使臺胞重新認識祖國，根絕日本人在他們心上種下的餘毒。人都是先入為主的，要矯正一種先入的錯誤觀念，比貫（按：「灌」之誤）輸一種正確觀念更難。當局行政上的措施，實在應該特別謹慎，根據臺灣的特殊情形，施以特殊教育才好。³⁷

面對台灣人對日本貨的推崇，錢歌川提醒當局應根據台灣的特殊情形，致力於矯正台灣人對「祖國」的錯誤認識，以根絕日本對台灣人思想上的支配，揭露了作者思考如何建設台灣時，既有中華民族主義的框架。

儘管錢歌川無意涉及政治，³⁸ 部分篇章還是暴露了當局統治上的一些問題。例如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的〈臺灣的吃〉，從台灣人受日本文化薰陶，中午食用「便當」，再介紹紅茶與釋迦、蓮霧、香蕉等名產，最後提到台灣原是米的產地，當時卻鬧著米荒，一般人要以甘薯充飢，有感而發地說出：

民以食為天，說到臺灣的吃，現在還很成問題，當局的人如果不能解決人民吃的問題，社會是不能安寧的。原來臺灣並無小偷乞丐，現在却到處皆是。街燈不明，是因為電燈泡都被偷去了的原故。住家的人，不能一刻走開，否則不僅家中的什物，連窗上的玻璃都要被盜。小民沒有吃

36 錢歌川，〈南臺雙泉試浴記〉，《三臺遊賞錄》，頁27。

37 錢歌川，〈芸窗漫筆〉，《三臺遊賞錄》，頁41。

38 錢歌川在〈一本禁書〉中說自己的文章，「從來都不涉及政治，正如我這個人一輩子都不涉及政治一樣」。《錢歌川文集》第四卷（中國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02），頁906。

的，你叫他如何能安分守己呢！³⁹

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日本殖民後期沒有小偷與乞丐的台灣，錢歌川來時已因鬧米荒而改觀。⁴⁰街上的電燈泡、家中雜物、窗戶上的玻璃都被宵小偷竊變賣，變化不可謂之不大，這是戰後台灣社會演變的第一手紀錄。

另外，作於1947年9月的〈拖〉，敘述前長官公署編餘的人員領取遣散費後，不依規定返回大陸兩個月後再來，而是迅速在台灣另謀新職，應扣還的遣散費不自動送還，往往拖幾個月就沒事了，⁴¹揭發中國官僚不遵守法規的「拖」字文化。1949年5月21日，《新希望週刊》刊載〈大三元——現階段的教授生活〉，⁴²批評國家只講武功，而不求文治之際，教育經費所占比例偏低，以教書為業者因薪資過低而生活清苦，若抱怨則會被當局視為有危險思想，就是共產黨，最後只能接受這樣的命運。透露執政者藉由扣上紅帽子，對議論施政得失者進行整肅的高壓手段。

1949年5月20日，台灣的戒嚴時期由這一天正式展開，錢歌川提筆寫下〈鄭成功是怎樣成功的？〉。⁴³藉由一封回覆友人私信的形式，表明此刻的台灣與鄭成功取自荷蘭時不同，島上的人不希望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裡。再借鄭成功以台灣為中興基地，扶明抗清的志願終究未能達成，等到清朝把大陸本土全部統一之後，台灣也就未能獨存的歷史，認為如果鄭成功當時不止於台灣，

39 味橄，〈臺灣的吃〉，《游絲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08），頁101。文末註明完稿時間為民國「卅六年七月」。

40 晚年回憶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社會的情形時，錢歌川曾說：「一般老百姓，都沒有足夠的食物，產米的地方沒有米吃，據說是運去作軍糧了。老百姓相當窮苦，到了寒冷的冬天也不過多加一兩件單衣而已。」這段話揭開戰後初期台灣糧食被轉運到國共內戰的大陸戰場，台灣窮苦的老百姓被無辜犧牲的政治黑幕，也等於為戰後台灣鬧米荒的背景做了補充說明。錢歌川，〈四十年前的台灣零憶〉，發表於「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1987.02.28，收於葉芸芸主編，《證言2·28》（台北：人間出版社，1993.02新校增訂第二版），頁186；另於《錢歌川文集》第四卷，頁934，但引文中的「冷」改為「寒冷」。

41 味橄，〈拖〉，《游絲集》，頁67-71。附帶說明的是，本篇原收入上海的中華書局於1948年出版的《游絲集》。

42 味橄，〈大三元——現階段的教授生活〉，《新希望週刊》13期（1949.05.21），頁6。略作修訂後改題為〈大三元〉，收入《蟲燈纏夢錄》（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05），頁106-110。之後再收入《蟲燈纏夢錄》（台北：雲天出版社，1970.12），頁111-115。

43 味橄，〈鄭成功是怎樣成功的？〉，《新希望週刊》14期（1949.05.28），頁6。文末註明寫作時地為「卅八年五月廿日臺北」。本篇從未收入錢歌川的文集，推測應該是為避免政治干預而自我克制的結果。

而能多收復些土地，清人未見得能容易把它解決，甚至大清一統的江山也不一定保得住，建議想步鄭成功後塵，到台灣來徐圖恢復的人借為殷鑒。當時國民黨在內戰中徹底失敗，退守台灣已是可預期的局面，錢歌川的發言無異在和當局唱反調。文章發表後半年多，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台，藉鄭成功反清復明自比，兩岸對立的態勢已然成形。

三、國族式微的焦慮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北朝鮮進逼南韓，隨後中國共產黨也派兵支援北朝鮮的軍事行動。為鞏固西太平洋防線，美國政府改弦易轍，轉而支持蔣介石政權，軍艦協防台灣海峽，並對台灣施以龐大的經濟援助，藉此防堵共產主義的擴散。台灣政府在美國扶植下，不僅藉由白色恐怖肅清異議分子，也透過反共文學的提倡與獎勵，與中共政權隔海進行政治思想戰。1950年12月，錢歌川以社會賢達的身分，受邀掛名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1954年10月，再度獲邀出任總統府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⁴⁴ 儘管當局以榮譽性的無給職加以籠絡，錢歌川始終將事業重心放在外語教學上，既無心於政治，也刻意與執政者保持距離。在此之前，甚至因為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蔣介石以草山行館為總統官邸，要洗溫泉多上草山（陽明山）的錢歌川遂發出：「可惜近來冠蓋雲集，頗感不便，所以我也有多時不去了」⁴⁵的牢騷。

五〇至六〇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之下，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晚年曾經自我表白政治立場，說出：「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⁴⁶的錢歌川，此時在台灣報刊發表的眾多隨筆雜文，從未涉及反共意識形態，⁴⁷維持從生活瑣事談及道德文化的一貫風格。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家十誠〉中，錢歌川首重「勿

44 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頁168。

45 錢歌川，〈烏來觀瀑記〉，《三臺遊賞錄》，頁34。根據文後附記，補記於1950年1月17日。

46 錢歌川，〈四十年前的台灣零憶〉，葉芸芸主編，《證言2·28》，頁189。

47 錢歌川離台後的1966年至1976年間，中共統治階級推動文化大革命。錢歌川雖然反對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舉動，但不反對共產黨統治中國，甚至對共產黨統治下中國的未來寄予厚望。例如錢歌川說：「十年浩劫發生於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們第一次回去時，文革正在高潮中，第二次回去時，文革甫告結束，第三次回去時，便已走上正軌，向着四化建國的大道前進着。我對於中國的現代化，是抱着極大希望和信心的。」引自《苦瓜散人自傳》，頁196。

趨炎附勢」與「勿亂喊口號」，他說：

第一、勿趨炎附勢：文藝是生活的反映，決非政治的產物。當道的政府可以尊重文人，但決不能因此提高文人的身分，尤其不能增加文學作品的價值。一個作家應以自己的作品，去爭取榮譽和地位，決不可藉某種政治力量，來為他作宣傳，而博得勢利小人的恭維。尤其不可自願去作御用文人，為權勢搖旗吶喊，而失去他固有的文人崇高的地位，無異自甘墮落。一個文人一朝染得有政治色彩，就不免要為清高而潔身自好的人們所不齒了。

第二、勿亂喊口號：凡是賣身投靠的人，總不能不替主子說話，寫的都是為人宣傳的文字，沒有一句真實的話語，滿紙都是些八股爛調，無非是亂喊一陣口號罷了。所以一個自愛的文人，莫不潛心於他自己的寫作，無暇去替人家搖筆桿，喊口號。⁴⁸

這段話充分表現錢歌川潔身自愛的自我期許，對於某些作家阿諛奉承權貴以求自我顯達，或藉八股爛調的口號文學以沽名釣譽的文壇歪風，委婉表達出諷諭之意。錢歌川堅持不隨政治風向起舞的文學風骨，由此可見端倪。

另一方面，仰人鼻息的中華民國政府，除了內政、外交各方面得受到美國牽制外，當然也必須容忍美國經濟勢力與文化的大肆入侵。錢歌川對此顯然有極大的憂慮，乃一再提筆撻伐。1956年5月出版的《竹頭木屑集》中，就有多篇以此為主題。例如〈烝民乃粒〉對醉心洋派的人全盤美國化的風潮，有以下的描寫：

只要是美國的東西就是好的，有人甚至說美國的月亮都比我們的大，其餘的可以想見了。

即令到了句踐臥薪，黎侯式微的時候，還是要穿美國的尼龍，吃花旗的大菜，一顧一問，唯美是從，一顰一笑，鼻息是仰。彷彿我們五千年

48 錢歌川，〈作家十誡〉，《罕可集》（台北：文星書店，1965.01），頁11-12。

來，沒有一樣東西是要得的，連用米為食都不如美國人吃麵包的來得營養。⁴⁹

當時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正借用越王句踐臥薪嚐膽的典故，標舉反攻大陸、中興復國的口號。這篇文章揭發台灣從政府到民間一味迎合美國，以美國動向與文化馬首是瞻的醜態。

除此之外，〈美化的人生〉描述台灣正在實際搬演的「美化」（美國化）人生時說：「美國的月亮比我們的大（這是根據某留美學生的報告），美國的東西，什麼都是好的，美國書中的思想，也絕對沒有不正確的。所以只要是美國出版的書報雜誌，什麼都可以進口，什麼都可以翻譯出版的」。日本出版品則是早已禁止入口，怕的是它的毒素；香港寄來的書也得花費不少時間嚴格檢查，才能送到收信人手上。但美國寄來的書，卻不必經過這樣的麻煩。⁵⁰

事實上，由於擔心接受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持續影響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中國接收政府早在1946年2月，即以「去殖民化」與「去日本化」為重點，開始查禁已出版的日文書籍與雜誌，⁵¹ 10月25日復取消報紙雜誌的日文欄。至於香港寄來的書得嚴加檢查，不難想知是因地理位置與中國大陸接近，親近中國共產黨的人士及團體活動頻繁，此舉乃是為了防堵共產主義對台灣的滲透。相形之下，美國的書報雜誌可以任意輸入與翻譯，美國人的各種觀點完全不予設防，這無疑是美國文化在台擁有的特權。

另一篇〈過年瞧街坊〉以一名稱為「老王」的大學教師，得知美國國務院駐華機關正招考「自由中國」（台灣）的中學英文教師到美國，作六個月的觀光之後，設法重新取得中學教師身分赴美。回台後的老王無條件地崇拜美國人和美國的一切，行事也以美國習俗為主，未先約好的朋友就不見面。獲悉最新一期的美國《讀者文摘》介紹，美國社會正式邀約宴請的事已逐漸減少，自由過從與便飯招待的事卻日益增多，覺得這是美國最新的傾向，可能就要風靡起

49 錢歌川，〈烝民乃粒〉，《竹頭木屑集》（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56.05），頁78。

50 錢歌川，〈美化的人生〉，《竹頭木屑集》，頁23。

51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9期（2006.09），頁150。

來，改口歡迎不約而來的訪客，並表示歡迎這種最新的美國作風，而換來對方的調侃：「狗屁！這原是最老的中國風俗，決不至因洋人反對而壞，也不至因洋人贊同而好，中國人不是洋奴呀！」⁵² 對部分崇洋媚外人士的奴性，給予極大的嘲諷。

根據學者趙綺娜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冷戰時期，美國跟蘇聯共產集團曾進行一場意識形態的殊死鬥。當時美國除了給予盟國軍事、經濟與技術援助之外，還積極促進彼此文化與社會的交流，藉以爭取外國人民的認同，保持美國在「自由世界」的影響力。對台政策之一，就是利用主動、單向且不對等的「教育交換」，推銷美國制度、價值系統與生活方式，以改造台灣成為「民主、親美」的國家。由於國民黨政府仰賴美國政府的支持，美國幾乎壟斷了海外文化輸入台灣的管道。⁵³

錢歌川在〈美化的人生〉中所說，根據某留學生的報告，美國的月亮比我們的大，以及美國書刊在台灣的自由流通；〈過年瞧街坊〉裡的老王以中學英文教師身分，接受美國官方資助赴美，回國後言行舉止無不向美國看齊，這些都印證了國民黨政府對美國政府的依賴，使得美國文化幾乎全面宰制台灣的局面；洞悉美國透過學生、書籍、教師等的交流，在台灣人心中建立美國語言與美國文化較為優越的印象。

強勢的美國文化浪潮席捲之下，台灣人的文化自信心不免逐漸流失。1964年1月出版的《狂瞽集》中，充分反映錢歌川對於部分台灣人「醉心洋化，嚮往上國」，以致「妄自菲薄」，「甚至瞧不起自己」⁵⁴的憂心。例如〈談標準〉這篇文章中，以今昔的強烈對比映照出，崇尚西方實學與西洋文化的結果，不僅傳統文化被棄若敝屣，舊道德也隨之淪落。有感於「從前死後也要歸葬故鄉，現在活着只想移民美國」，錢歌川以戲謔式的玩笑話，要求標準局制定一個做國民的標準，「例如：國民不能出賣祖國，也不能無故放棄祖國，他

52 錢歌川，〈過年瞧街坊〉，《竹頭木屑集》，頁48。

53 美國官方與此相關的法案與做法，以及在台推動教育交換事務的經過，詳情請參考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究》31卷1期（2001.03），頁81-127。

54 錢歌川，〈萬舞洋洋〉，《狂瞽集》（台北：文星書店，1964.01），頁40-42。

要能說本國話，認識本國字，要知道現在祖國就在臺灣島上，而應有式微之感」，⁵⁵ 流露出國家興亡的憂患意識，披露傳統文化崩壞瓦解之下，國族認同朝美國傾斜的現象。

除此之外，錢歌川在〈年輕的一代〉中形容台灣的年輕人，「他們入學的目的，不在讀書，而在升學。升學的目的，不在大學畢業，學有專長，服務社會，而在出洋赴美，取得美國的居留權，不再回來。以一個自由中國的青年，而有朝一日成為美國的公民，便達到了理想的境地。」又說：「其實一個國家的年輕的一代，原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應負起繼往開來的責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老朽遺民，偶有作遁世之想的已屬不當，年輕的人，怎樣可以一走了之呢？」⁵⁶ 當年「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順口溜風行一時，正是台灣學子盲目追求美國化的最佳寫照。

錢歌川曾經慨嘆從前出國遊學的人，都是對國文很有根底，對國情很是熟悉的人；後來送到美國的則是出國之前，既不知道自己的國情與文化，甚至連國字都還沒學通，所以容易受別人誘惑，忘記自己的立場，變成不愛本國而親外國的份子。⁵⁷ 雖然本身的專業在外文領域，並不反對注重外文和科學，但錢歌川總強調不必要廢棄國文，而使固有文化泯滅。⁵⁸ 因為錢歌川認為，「保留各自的本來面目，從民族的立場上講，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延續自己的種族，保留自己的文化，必須拒絕全盤洋化，不可故意遺棄自己的國語文字，尤其不可毀滅自己的本色」。⁵⁹ 這是基於中華民族的立場，對衰落的中國可能步向滅亡的恐懼。要求「現代中國人」（指「台灣人」）「能說本國話，認識本國字」，顯示錢歌川希望台灣人藉由共通的語言文字，由外而內重塑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以賡續中國文化的道統。

55 錢歌川，〈談標準〉，《狂瞽集》，頁184。

56 錢歌川，〈年輕的一代〉，《狂瞽集》，頁49-50。

57 味橄，〈人貴自知〉，《淡煙疏雨集》（台北：晨光出版社，1952.10），頁51-52。

58 錢歌川在〈何必「揚棄」〉中說：「我不反對注重外文和科學，但不必要廢棄國文，而使固有的文化泯滅。」見《罕可集》，頁10。

59 錢歌川，〈人有本色〉，《狂瞽集》，頁78。

四、等是有家歸未得

從錢歌川入台之後的作品主題來看，除了對台灣風土、社會現實的描繪，與對當局的婉言批判，五〇年代大陸來台作家的鄉愁文學，也成為錢歌川筆下經常可見的創作主題。1948年5月29日，錢歌川發表五言律詩〈臺北邨居〉：「未老鬢先霜，田園靜興長。久居猶是客，微醉不成鄉；庭桂終年發，游蜂竟日忙。杜鵑頻喚裡，歸夢入蒼茫。」⁶⁰不知是否憂煩內戰的擾攘不安，將連帶影響歸鄉之期，錢歌川雖未老而先衰，以至鬢髮斑白。詩中音似「不如歸去」的杜鵑鳥啼聲，「久居猶是客」，「歸夢入蒼茫」，莫不傳達內心底層對於返鄉的渴望。這是錢歌川在台作品中，首度流露出客居台灣的思鄉情懷。所謂「久居」只是用來表現被迫滯留的無奈與不耐，距離踏上這片土地那一天，不過短短的一年兩個月。

隨著時間的繼續往前推移，國共內戰情勢急轉直下，1949年5月19日台灣當局宣佈次日起實施戒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國，兩岸分治的態勢幾乎已成定局。10月6日，錢歌川寫下〈三十年前的中秋夜〉，回想十七歲離家之後漂泊異鄉，沒有好好地和家人團聚過一個中秋，只有小時跟隨父母膝下才過得最為愉快。接著錢歌川描寫當年負笈日本前，全家人在中秋佳節團聚時，「在團圓中有惜別，在歡樂中有傷感」兩種情懷交織的難忘回憶。末段說：

這種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不幸父親棄養已十有五年，而母親在耄耋高齡，還要流離顛沛，獨自避難住到家鄉去，使我們為衣食奔波在外的兒子，不能侍奉晨昏。想起三十年以前的中秋夜，祖母設香燭果盤拜月，家中老小都像煞有介事地來過節，大家悠閒地吃雪藕紅菱，對月飲酒，那種心情，已經不是我們現在亂離之世，勞碌奔波的生活中所能再

60 錢歌川，〈臺北邨居〉，《公論報·日月潭》170期，1948.05.29。這首詩收入《湖山入興樓詩》時，改題為〈臺北村居〉。附帶說明的是《湖山入興樓詩》並未註明出版時地，錢歌川在《苦瓜散人自傳》中說：「我也曾在甲子一週後，刊印過一部《湖山入興樓詩》的拙作，是非賣品，只用來贈博親友一粲」（頁192）。《雲容水態集》書後所附〈錢歌川（味橄）著作年表〉標示：「湖山入興樓詩（非賣品）一九六九年初版」，不過由於《湖山入興樓詩》收錄1976年出版的《秋風吹夢錄》書前的〈題辭〉，該書〈題辭〉後有「一九七二年歌川自題」的文字，目前僅能確定《湖山入興樓詩》由作者自刊，時間則有待考訂。

有的了。⁶¹

亂世中離鄉背井，無法善盡為人之子的孝道，遙想當年全家過節時悠閒的氣氛，盡是月圓而人未能團圓的感慨。

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台。當月，錢歌川寫下〈椰陰秋興〉，訴說被迫定居台灣的心情：

渡海來臺，忽忽又快三年了。雖說時間也不算短促，但始終似乎就沒有安定下來。初來時甫在不幸的二、二八事變之後，大家對於臺灣都裹足不前，我認為要從事教育，為臺胞效尺寸之勞，那正是時候，所以毅然決然辭去南京的職務，舉家遷臺。原擬輔助前任臺大校長陸筱海兄把文學院辦起來，弄得有點規模，就退避賢路的。當時預計一年至多兩年，就可以重回大陸去的。想不到世變日亟，至今還留在這島上無法回去。從事業上講，我是喜歡住在上海；以居家而論，則游遍世界歸來，我還是最愛北平。臺灣似乎對我並無特別的依戀。⁶²

入台未滿三年，由於政局的變化導致歸鄉之路受阻，從前高呼的「相見恨晚」，瞬間變成「並無特別的依戀」。為了讓自己留在台灣能少點苦惱，錢歌川決定「從中去找尋樂趣，發掘它的美點，以謀自己的慰藉」。⁶³

從既有的資料來看，1953年出版的《三臺遊賞錄》，應該就是錢歌川為謀求慰藉所寫出的作品集結而成。在台灣島內旅行與賞玩景物，成為逃避現實困境與抒發憂悶的一種方式。然而書名的「遊賞」二字，恰好折射出錢歌川以「外來者」自居的視角，⁶⁴故鄉的記憶也屢屢在不經意間，被台灣相似的景物從心底勾起。除了提到阿里山的雲海奇觀時，說自己「在峨眉山的金頂，在一

61 錢歌川，〈三十年前的中秋夜〉，《罕可集》，頁91。

62 錢歌川，〈椰陰秋興〉，《三臺遊賞錄》，頁50。

63 同註62。

64 錢歌川在〈南臺雙泉試浴記〉中，有「我們外省人既到了台灣」之說，是他以「外來者」自居的另一證據。《三臺遊賞錄》，頁29。

萬呎的高空上，在阿爾帕斯的白峯上，看過雲海來的人，對此並不覺得怎樣稀奇，⁶⁵兼有海內外遨遊的各種記憶之外，其餘評論台灣景物的篇章，經常以過去在大陸的經驗作為對照。

例如：提及台北附近的碧潭和劍潭時，錢歌川說它們「雖被認為水鄉勝地，惹人前往流連泛舟，但在我們來自八百里洞庭湖畔的人看來，只是一些小池而已」；⁶⁶形容台中街市為「東西兩條河邊的垂柳，臨風起舞，尤有江南風味」；⁶⁷在阿里山附近的祝山看日出，「似乎也不及在泰山的美」；⁶⁸評四重溪溫泉水質之佳，以西安的華清池、重慶北碚石灰泉相比；⁶⁹遊關子嶺的碧雲寺時，因心中有北平碧雲寺的印象而大失所望；⁷⁰論北投溫泉則說，「像當年的重慶，烟花薈萃，甚至有女人伴浴」。⁷¹在在襯托出閒情逸致遊賞台灣的表象背後，其實是一個異鄉人難以言傳的苦悶。

爾後，錢歌川一連發表了許多懷舊的文章。例如〈過去的好日子〉回憶在上海住過的房子，慨嘆「至今流寓在這孤島上，更不知何時再能賡續那種舊夢！」「過去的永遠過去了，那些好景，只好向舊夢中去追求，向回憶中去發掘，也正像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悄悄來一樣，是無可挽回，也無可抵抗的」。⁷²遷居在他鄉的孤島台灣，舊時活動的空間完全無法觸及，經過時間的沉澱之後，已然逝去且了無痕跡的昔日益顯珍貴，如今卻只能在舊夢與回憶中尋覓，由此不難想見錢歌川心情的沉痛。

到達台灣四年後，迎接1951年的來臨，錢歌川以〈新年和童年〉感慨：「在流寓中過新年，實在沒有一點令人喜慰的事。」又說：「我們到台灣來，既沒有異國的情調，使我們忘却客邊的孤寂，又沒有親切的環境，使我們減少故鄉的懷念，所以到新年的時候，特別覺得百無聊賴，嘆息年華逝水，來日無

65 錢歌川，〈雨遊阿里山〉，《三臺遊賞錄》，頁23。

66 錢歌川，〈日月潭探幽〉，《三臺遊賞錄》，頁13。

67 同註66，頁14。

68 同註65，頁24。

69 錢歌川，〈南臺雙泉試浴記〉，《三臺遊賞錄》，頁26。

70 錢歌川，〈重遊關子嶺〉，《三臺遊賞錄》，頁32。

71 錢歌川，〈烏來觀瀑記〉，《三臺遊賞錄》，頁34。

72 味橄，〈過去的好日子〉，《淡煙疏雨集》，頁29-30。

多，那些愉快的好日子，似乎永遠成了陳跡，今生不可再得了」。⁷³ 過去美好的時光已如逝水般杳然無蹤，應是喜慶的新年只徒增傷感，言語中盡是辛酸與苦楚。

除此之外，作於1958年1月的〈海陬十稔〉，同樣描寫了「每逢佳節倍思親」的痛苦，文章一開頭就說：

每到歲末年初，一個人總不免有些感觸，尤其是像我們現在這些等是有家歸未得的人，更是感慨萬端，不堪回首。流寓海隅，聽濤聲故國，夢中識路，依稀回到了家園，那兒有你的老母，或是兒女，或是兄弟故舊。啊，音書斷絕，忽忽又是十年了。

又說：

就近在抗日時期，大半的國土都為敵人佔領，我們只保全了西陲一小部分地方作為反攻基地，但仍然得和淪陷區的家人故舊，函札往還。甚至那裏的人，也可以間關到自由地區去，並不受阻撓。而我們現在所處的，卻是亙古未有的「大時代」，說它是戰時，又未見實際有人放過一槍，說它是平時，却枕戈待旦，天天過著戰時生活。最苦的莫過於和家鄉交通斷絕，甚至連魚雁都不能通，這確是史無先例的一種境遇，它諷刺着身留自由世界中的自由的人的自由。⁷⁴

對日抗戰時期就算在反攻基地，尚能與淪陷區的家人朋友互通魚雁，淪陷區的人亦可設法到反攻基地去；如今身在號稱「自由世界」的台灣，卻失去和大陸的家人聯絡往來的自由。前所未有的境遇，彰顯出兩岸政權對峙之下，親情倫理被犧牲的荒謬。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章中，錢歌川將「故國」等同於在海那邊已經回不去的「故鄉」，與位於「海隅」的台灣對立起來。

73 錢歌川，〈新年和童年〉，《蟲鐙纏夢錄》，頁120-121。

74 以上兩段引自錢歌川，〈海陬十稔〉，《罕可集》，頁207-208。

〈苦悶的象徵〉中也說：「你在美國，乃至天涯海角，起了鄉思，隨時都能回到臺灣來。惟有在臺灣的外省人，不能發生鄉思，一度發生鄉思，便要變為鄉愁，因為等是有家歸未得，青春結伴也無法還鄉的。」⁷⁵ 突顯僅隔一道海峽的台灣與大陸間，由於無法互相交通，已成為錢歌川心目中最遙遠的距離。錢歌川以在「臺灣」的「外省人」自稱，再度揭露難以認同台灣的內在心聲。相對於朝朝暮暮只求回歸的故土，此刻立足的台灣也只能被稱為「異鄉」，這是大陸遷台人士無法落地生根的緣由。

尤其花甲之年想到年邁的母親仍然健在，卻未能定省晨昏，錢歌川乃以七言律體寫下〈六十書懷〉一詩：「中年銷盡海東頭，癸卯重逢甲一周，莫道此心如止水，只緣幽夢繫歸舟；迢迢羈旅偏懷故，八八慈親正進籌，獨倚西樓凝望眼，關河萬里白雲浮」，⁷⁶ 清楚表達無法承歡膝下的遺憾，並以「我母親有十七年沒有见到我這小兒子了，她一定是倚閭望我回去的」，「不但我母親『欲』見我回去，我也決心要回到膝下的」，⁷⁷ 堅決表明還鄉的心願。無法排遣和親人關河阻隔之苦的錢歌川，終於選擇從台灣出走。

五、遙望台灣是故鄉

1964年6月，藉著應聘新加坡義安學院的契機，錢歌川得以順利離開台灣。⁷⁸ 〈去國情懷〉詳細描繪了當時的心境：

我出國多少次，從來沒有像這次離開臺灣時心情這般沈重的，我在五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餘，登上國泰航空公司的噴氣機，從臺北松山機場起飛出國，向臺灣島揮手作別的時候，我感到無限的感傷。

75 錢歌川，〈苦悶的象徵〉，《狂瞽集》，頁22。

76 引自錢歌川，〈行年六十〉，《罕可集》，頁2-3。這首詩收於《湖山入興樓詩》（頁18）時沒有標點符號，並有些許文字上的更動。「癸卯重逢甲一周」改為「癸卯重逢甲子周」，「只緣幽夢繫歸舟」改為「祇緣幽夢繫歸舟」，「迢迢羈旅偏懷故」改為「迢遙客舍偏懷故」，「八八慈親正進籌」改為「毫臺萱堂正進籌」。

77 錢歌川，〈行年六十〉，《罕可集》，頁2。

78 當時從台灣出國並非易事，錢歌川先以一紙總統府發出的聘書到戶政機關，將國民身分證上的現職修改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得以擺脫陸軍官校教授等同於「軍人」的身分，辦妥出國手續，再以「休假」的理由，順利離開台灣。參見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頁168-169。

不消說，戰後從大陸到臺灣的人，十多年來並沒有真正的安定居留，都還多少帶有一些流離失所的味道。把大陸拋棄在背後，蝸居在這小島上，總不免有式微之感。都是有家的人，遙望海峽那邊的大陸，欲歸不得，又怎樣能甘心做個島民，作長久的打算呢？

在這樣一種不安定的心情中，年復一年地居住了十七年之久，不但是有家歸未得，甚至連對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不能通訊，可說是充分體味著了隔絕的痛苦，一旦飛離故國，愈行愈遠，自然更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⁷⁹

由於離台就是離開國境，大陸的家園從此更形遙遠，錢歌川雖然掙脫而去，心情卻難免沉重與感傷。

接著，錢歌川說將要「離開一個生活了十七年的家國」，「除了對國家的依依不捨外，別的我都一點也不留戀了」。從飛機上遠望茫茫雲海時，錢歌川甚至反問自己：「故國愈離愈遠了，這總不會是再一個流浪生活的開端吧」。⁸⁰ 文章中對自我心靈世界的深入剖白，清晰呈現飛離那一刻難以言傳的複雜情緒。相對於異國的新加坡，當時的台灣作為蔣介石政權對外聲稱的「自由中國」，與中國大陸連結的所謂「故國」的意義，也就在揮手作別的時候清晰浮現。這篇文章中不只稱台灣為「家國」、「國家」，以離台為「出國」、「去國」，更有兩度稱台灣為「故國」。以前引〈海陬十稔〉中「故國」意指「故鄉」來看，錢歌川對台灣的認同已隱約浮現。

關於離台時的心情，錢歌川還作有〈戲改賈島詩〉曰：「客舍臺灣十七霜，歸心日夜憶瀟湘。無端更渡南華海，卻望臺灣是故鄉。」⁸¹ 詩題與內容脫胎自賈島〈渡桑乾〉：「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錢歌川晚年回顧這一段時，也曾說自己在台灣一住17

79 錢歌川，〈去國情懷〉，《秋風吹夢錄》（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76.03），頁1。

80 同註79，頁2及頁4。

81 錢歌川，《湖山入興樓詩》，頁23。原文無標點，為讀者閱讀方便，標點為筆者所加。以下引自《湖山入興樓詩》者皆同，不再附註說明。

年，和出生地湖南居住同樣長久，「離開大陸的故鄉，遼遠得可望而不可即，只好把這流寓的孤島，當作自己的老家了」。⁸² 在台灣時日夜思念著故鄉湖南，辭別台灣之際，台灣在錢歌川的心中竟從此產生了位移，從「異鄉」一變而為「故鄉」。

移居新加坡後，終於獲得與隔絕將近二十年的大陸親友聯繫的機會。⁸³ 然而由於手持台灣護照，未被允許進入大陸，返鄉的心願依舊未能達成。⁸⁴ 移徙至新加坡的第二年，錢歌川在〈抵星周歲〉中，以「異邦物態無殊故，未卜歸期再幾年」，⁸⁵ 抒發一年來身處異國，歸鄉之日仍遙遙無期的落寞與惆悵。1966年（歲次丙午）中秋節，從1964年6月抵達新加坡以來，適逢第三次的秋天，錢歌川書寫〈丙午中秋偶成〉一詩，其中「時嗟王粲賦，心戀秣陵遊」⁸⁶ 兩句，用王粲〈登樓賦〉的登高望遠引發懷鄉之念，以及同為江南人的劉禹錫未曾親往秣陵（南京）一遊的遺憾，訴說身在南方熱帶國度思念江南故土之苦。

1976年出版新作品集《秋風吹夢錄》時，錢歌川還特別以作於1972年的題辭取代序文：

何期垂老復投荒
幸有三端兩擅場
人世幾回能自主
秋風吹夢到南洋⁸⁷



82 錢歌川，〈依親生活〉，原收於《浮光掠影集》，引自《錢歌川文集》第四卷，頁831。

83 錢歌川說：「勝利後去日本，後轉台灣，一住十七年，才得脫離樊籠，應聘去新加坡。隔絕了將近二十年的國內的親人，此時方有通訊的機會，取得聯繫。」〈歸思〉，《雲容水態集》，頁95。

84 錢歌川，〈依親生活〉，《錢歌川文集》第四卷，頁831。

85 〈抵星周歲〉有兩首，第一首內容為：「鳶帆六月渡南天，聞說炎方不諱錢。偏自遠來尋墜緒，黃雞白髮又經年。」本文兩句出自第二首：「車走雷聲夜不眠，思潮起伏似雲煙。異邦物態無殊故，未卜歸期再幾年。」《湖山入興樓詩》，頁19。

86 全詩內容為：「孰謂虛名誤，無能何所求。時嗟王粲賦，心戀秣陵遊。再到炎方域，三逢節令秋。藏修猶自得，人事不堪籌。」《湖山入興樓詩》，頁19。

87 引自錢歌川，〈題辭〉，《秋風吹夢錄》書前。〈題辭〉後有「一九七二年歌川自題」的文字，應指作於1972年。本詩另題為〈甲辰秋南渡星洲移館義安學院〉，收於《湖山入興樓詩》，頁18。

詩中的「投荒」用以形容赴星洲時，宛如被流放到遙遠之地；「人生幾回能自主」則是人生在世，諸事難以自主的慨嘆。再度反映了〈去國情懷〉中亟欲歸鄉，距離卻越來越遠，無法自我掌控的命運。題辭的1972年間，錢歌川已定居新加坡八年之久。這一年的年底，錢歌川從南洋大學退休，面臨「回台灣」與否的抉擇時，因為兩個女兒都在美國，台灣已無親人可以依靠，於是決定再度遠行。⁸⁸

赴美依親之後，由於美國與中共政權的關係解凍，錢歌川在1974年之後數度回到大陸省親，與久別的親人歡聚。⁸⁹ 即使如此，鄉愁依然從筆尖不斷地傾瀉而出。1981年，《錢歌川散文集——瀛壖消閒錄》出版，錢歌川自我剖陳，「我現正寄寓異邦海上的港市，因題名為〔瀛壖消閒錄〕」。⁹⁰ 1983年，新書在中國北京上梓，錢歌川說：「近十年來，我在海上的紐約流浪，時有烟波江上任飄流的感覺，所以此書題作《浪迹烟波錄》」。⁹¹ 1985年，《楚雲滄海集》由錢歌川的出生地湖南發行，書前附有錢歌川的手跡，內容是1984年作於秋天的題辭，開頭兩句「天涯倦客類飛蓬，處々隨緣寄我躬」，⁹² 正用以呈現他隨時勢而漂泊，無所安居的處境與心情。

八十高齡之際，錢歌川在〈故園東望路漫漫〉中，深入描繪了久居異邦的苦悶，他說：

我在美國居留，並沒有移民來的人那樣輕快，那樣安心。他們渡來以後，安家落戶，就想世世代代的做美國人，如果是遠東來的，恨不得頭

88 錢歌川說：「從新加坡退休下來，我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回台灣弄個小房子住下來，琴書自樂，與世無爭。另一條路就是上美國依親生活，我的兩個女兒都在美國，台灣已無親人可以依靠，所以我就選擇了第二條路，渡過重洋來美了。」見〈依親生活〉，《錢歌川文集》第四卷，頁831。

89 從既有的資料來看，錢歌川回中國省親至少有四次，第一至第三次分別在1974、1978、1982年，第四次在1986年。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頁195-196；錢歌川，〈溯江遊三峽〉，《錢歌川文集》第四卷，頁968。另外，錢歌川說：「我每次回國，第一個目的，就是探親，其次才是遊覽。」「重洋遠隔，難得相逢，每次見面，都要歡聚幾天，然後依依惜別。」錢歌川，〈桂林會親〉，《楚雲滄海集》（中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09），頁85。

90 錢歌川，〈前言〉，《錢歌川散文集——瀛壖消閒錄》，頁1。

91 錢歌川，〈後記〉，《浪迹烟波錄——錢歌川雜文集》（中國北京：友誼出版公司，1983.09），頁176。

92 錢歌川，《楚雲滄海集》書前所附錢歌川手稿影本。

髮變褐，眼珠變藍，好更容易與美國人同化，免受歧視。但我不是移民來的，只是流浪至此，暫時作客，我不願入籍，我居之不安，我時時都有寄人籬下的感覺。並不是想像中的情緒，而是實際上的體驗。家與國雙重的寄居，沒有著落，沒有發展。⁹³

相對於「流寓海隅」時，台灣在名義上仍是「故國」，仍能以此地為「家」；美國社會白種人歧視有色人種的流弊，讓堅持不被同化的錢歌川無法迴避，從而感受到的是「家」與「國」的雙重寄居，同時也是「家」與「國」的雙重失落。

英國學者麥克·克朗（Mike Crang）在〈國族、家鄉與雜種世界裡的歸屬〉中曾經強調，「文化沒有『本質』的核心，而總是在互動與移動之中塑造出來的『雜種』」，並指出「討論文化時，最為顯眼並富有政治意蘊的方式，就是從國族認同的角度出發了。國族性（nationality）不只是個政治—法律地位，也涉及我們相信自身所擁有的社會特徵，我們與同胞共有的特質。」藉由塞爾維亞人、喀什米爾人和魁北克人的運動裡，「文化認同都被視為固定的客體，一代傳諸一代，也具有領域特性，該文化的空間充滿了族群或國族觀念——形成了『血與土』之間的強大結合。」「這種族群國族主義認為文化等同於空間，而空間等同於人民——這便形成了循環邏輯，及某人歸屬於某個空間的權利，端視其是否擁有用以指認該領土的文化」。⁹⁴

這些話足以說明錢歌川置身於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素有「民族大熔爐」之稱的美國社會，出自於對「中華民族」（或「中國人」）這個「共同體」的想像，⁹⁵視美國人為「他者」（Other），美國領土為文化上的「異域」，終

93 錢歌川，〈故園東望路漫漫〉，《浪迹烟波錄——錢歌川雜文集》，頁159。本篇又題為〈行年八十〉，本段引文收入《楚雲滄海集》，頁131。

94 Mike Crang原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8.09初版五刷），頁214-215。

95 Benedict Anderson（班納迪克·安德森）界定「民族」（nation）的定義時說：「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3.11初版八刷），頁10。

究無法將之作為歸屬之地。因此，始終執著於中華文化的錢歌川，基於封建中國的「夷夏之辨」，甚至將美國稱為「海外番邦」。⁹⁶ 反觀由中華民國管轄的台灣人民，因為被納入中華民族的論述之內，台灣仍得以成為錢歌川暫時安居的「家」，及與其身分認同相符的「故國」。⁹⁷

1990年錢歌川病逝於紐約，終其一生並未遷回中國大陸。在美國撰寫的〈四十年教學生涯〉中，錢歌川稱台灣為「居住十七年之久的第二故鄉」。⁹⁸ 1987年，在紐約參加「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時，錢歌川也曾自述：「大陸是我的出生地，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⁹⁹ 由此可見遷居台灣的經歷，在他個人生命史中的重要性。然而這個重要性卻直到離境，並且越行越遠之後，才讓錢歌川在回眸時有所體會而領悟。另一方面，相對於「故鄉」的空間座標可以隨著所在的位置，從唯一的原鄉中國大陸，轉而將台灣視為第二故鄉；錢歌川無論身在何處，中華文化這個精神上的原鄉永遠不變。也因為從台灣、新加坡再到美國定居，距離中華文化的空間日益遙遠，國族衰亡的焦慮感也就在無形間次第加深。

六、結論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總督遵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時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承諾，將台灣交由中華民國接收。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台灣的政治新局從此展開。1946年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爆發全面性的內戰，1949年大陸落入中國共產黨之手。政權遞嬗之際，台灣本地的總人口約有六百萬；隨著國民黨政府退守來台的大陸軍民，保守估計至少有近百萬人之

96 錢歌川，〈雙重籬下〉，《浪迹烟波錄——錢歌川雜文集》，頁161。

97 如前所述，錢歌川所謂的「故國」除「祖國」外，兼有「故鄉」之意。對錢歌川來說，台灣是他的第二故鄉，但台灣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國領土範圍內的一個地方名詞。錢歌川晚年曾說：「直到一九七二年尼克遜打通了去中國的路，我又持有美國的永久居留證，回返祖國的願望，終於可以實現了。在我七十二歲的時候，果真白頭重到江南。」由此可知，中國始終是錢歌川心目中唯一的祖國。引自錢歌川，〈白頭重到江南〉，《錢歌川文集》第四卷，頁839。

98 錢歌川，〈四十年教學生涯〉，《錢歌川文集》第四卷，頁868。

99 錢歌川，〈四十年前的台灣零憶〉，葉芸芸主編，《證言2·28》，頁189。

多。¹⁰⁰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後開放赴大陸探親為止，散佈在各行各業的大陸來台人士，與故鄉之間的聯繫面臨長年斷絕的窘境。九〇年代以來，大陸遷台世代在文學界的整體表現，逐漸在台灣研究的領域中受到關注。

在〈新遺民情結與美學的拯救意義〉這篇短文中，學者黎湘萍考察台灣的文學理論後，把五〇至八〇年代在台灣出版，並產生了一定影響的主要文論著作，不限於台灣島內學者所撰述的文學理論著作，而且涉及曾在台灣後到香港和海外的學者，以及對台灣文論界有較大影響的海外華人學者的有關著作，將這一批學者稱為「新遺民」。黎湘萍解釋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在海外，都與近代以來花果飄零的中國文化保持著比較密切的精神聯繫，要麼具有復興中華文化的信念，要麼通過漢語寫作來承續這一傳統。幾十年來，他們基本上都在與大陸相對“隔絕”的情況下從事自己的文學理論研究工作的」。也談到他們有其共同特徵，「譬如其移民式的流動性與對於語言和精神文化的近乎迷戀的記憶和分析，似乎正是近代中國以後的“新遺民”的主要特徵」。¹⁰¹

學者王德威由黎湘萍的文章獲得靈感，將「新遺民」的意義再加引伸。他說：「『遺』，可以指的是遺『失』，是『殘』遺，也可以指的是遺『留』」，「移民背井離鄉，另覓安身立命的天地」，「遺民則逆天命，棄新朝，在非常的情況下堅持故國之思」。談及乙未割台所激發的遺民論述時，王德威也申論「『遺民』的本義，原來就暗示了一個與時間脫離的政治主體。遺民意識因此是種事過境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它的意義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已經消失的邊緣上」。接著再把「遺民一詞，原泛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加以推衍，統稱1949年之後隨著國民黨撤退來到台灣的軍民為「新遺民」，認為反共文學、懷鄉小說散文都涵

100 關於1949年前後外省來台人口數，王育德、柴雅珍、高格孚、李棟明、黃宣範等人各有不同的估計，少則近百萬，或曰一百多萬到兩百萬人之間，甚至有高達兩百五十萬人之說。詳見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一九五〇—一九八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06），頁71之註17。

101 黎湘萍，《文學台灣——台灣知識者的文學敘事與理論想像（增訂版）》（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04），頁292-293。

蓋在新遺民美學辯證之內。同時，王德威也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更見證時間的裂變」。¹⁰²

從錢歌川的自願來台，到被迫「遺留」在台灣的經歷，以及前引〈海陬十稔〉中將原鄉稱之為「故國」，將在台定居稱為「流寓」，〈年輕的一代〉中談教育青年的方法，以「老朽遺民」對比「年輕的人」，可以發現他確實以「遺民」自居，並在「空間」與「時間」兩方面表現身為遺民的悲愁與苦悶。一方面，政權的更迭導致兩岸的長期隔絕，居台期間，錢歌川只能從此方的台灣遙望彼方的大陸，成為被阻絕於故國原鄉土地之外「空間」上的遺民；另一方面，基於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情有獨鍾，除了有《湖山入興樓詩》彙集古典詩作之外，散文創作中亦經常可見引經據典，或夾雜著自創的舊詩，¹⁰³甚至有多本文集的書名取自古典詩文，¹⁰⁴多種作品集以題辭方式代替序文，¹⁰⁵顯然對中國文化經典與舊詩寫作投注頗多的心力。因此學貫中西的錢歌川雖以外語教學和英美文學見長，卻因認同儒家思想與傳統的倫理道德，有感於道統的淪喪與美國文化的入侵，唯恐中國與中華民族走向滅絕之途，乃不時批判所謂

102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1），頁25-27、頁34-35及頁46-47。在此必須加以說明的是，王德威將戰後大陸來台第一代作家的書寫稱為「新遺民」，另以「後遺民寫作」一詞來包含未曾經歷過戰亂的大陸來台第二代作家（例如朱天心）的文學創作。另外，儘管挪用黎湘萍與王德威有關「新遺民」的概念，筆者使用「遺民」來稱呼錢歌川，乃根據錢歌川在創作中的自稱，與兩位學者用「新遺民」以指稱1949年之後隨國民黨政權來台的作家，所指涉的意義仍有差異，詳如後述。

103 例如散文〈故園之戀〉以自撰的七律開場，接著提及自己創作的「杜鵑頻喚裡，歸夢入蒼茫」等詩句，以及「等是有家歸未得」、「每逢佳節倍思親」兩句唐詩。再者，「芳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來自王維〈送別〉詩中的「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戰後猶厭言兵的廢池喬木」改寫自姜夔〈揚州慢〉中的「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陶令可以掛冠」則是出自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因而掛冠歸去的典故。參見《狂瞽集》，頁225-226。

104 例如《竹頭木屑集》乃引《晉書·陶侃傳》大將軍陶侃善用造船所餘竹頭木屑，希望讀者學習陶侃從無用中找出這本書的用途。參見錢歌川，〈後記〉，《竹頭木屑集》，頁100。另外，《狂瞽集》的書名與南朝虞寄致陳寶應書中「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之語有關；錢歌川亦曾提及採用「狂瞽集」之名，出典可追溯到東晉的詞賦大家郭璞所說：「敢肆狂瞽，不隱其懷」。錢歌川，〈自序〉，《狂瞽集》，頁1；錢歌川，〈作品的題名〉，《秋風吹夢錄》，頁124。

105 24本創作集中，《北平夜話》、《觀海集》、《偷閒絮語》、《巴山隨筆》、《游絲集》、《淡煙疏雨集》、《三臺遊賞錄》、《蟲鏡纏夢錄》、《秋風吹夢錄》與《浮光掠影集》都以題辭取代傳統的序文，《楚雲滄海集》書前附有錢歌川的題辭手稿影本。另根據錢歌川的回憶，《浪迹烟波錄——錢歌川雜文集》原附有短詩代序，初版時遭編者刪去，《錢歌川文集》第四卷已重新收入。參考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頁191。

「美國的月亮比我們的大」，以及年輕人升學之目的，在取得美國的居留權等種種崇洋媚外的風氣。這些都顯示錢歌川嚮往古老中國的精神文化，對於西方物質文明的末流採取抗拒的姿態，成為現代「時間」上的遺民。

若深入考察錢歌川的身世經歷與作品精神，其實與王德威所謂「新遺民」的定義不盡相符。以來台時間與原因兩點而言，錢歌川早在政府遷台兩年多前的1947年3月就已來到台灣，移居台灣的背景與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完全無關。正因與1949年大批隨國民黨政權流亡來台者有所不同，錢歌川的懷鄉書寫僅抒發個人身世的感慨，以及回返故鄉與親人重逢的心願，截然不同於其他大陸來台作家普遍揉合國仇家恨的筆法。甚至談及台灣與大陸的長期隔絕，始終歸因於美國第七艦隊的協防台灣海峽，¹⁰⁶而非當年流行的「共匪竊據大陸」之說。錢歌川與反共無涉的「故國」之思，不僅與同時代大陸來台作家的「反共懷鄉文學」¹⁰⁷有別，其中更暗藏對國民黨政權讓美國政府介入兩岸之間的怨懟，具體證明大陸來台作家的文學寫作，確實有比今日學者所見「新遺民美學」更為繁複的意涵。

另一方面，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前期居台期間，在高壓的白色恐怖統治下，錢歌川的散文雖然仍是一貫從小事情、小典故擴及為人處世的道理，但已失去了以往像〈拖〉那般批判官場文化的內涵，或揭露國民黨施政不當對民眾生活的衝擊，而以另一種和政治現實疏離，著重描繪生活瑣事，或者批判傳統道德淪喪的隨筆雜文，建立起個人的獨特風格。然與1967年成立的中華文化復

106 錢歌川離台後，多次在文章中怪罪美國介入台灣與大陸之間。例如《苦瓜散人自傳》中說：「台灣自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就使台灣和中國大陸完全隔絕，兩地的親人音訊不通，不要說人的來往了。台灣的這種閉關自守的國策，把老百姓囚禁得好比籠中之鳥，想飛也飛不出去。」（頁183）。〈白頭重到江南〉中也直指，「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從此使得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分隔開來，老死不相往來了。」又說：「第七艦隊坐鎮其間，不許雙方動武，一切信息都斷絕了。」（《錢歌川文集》第四卷，頁837）由於在台期間錢歌川不曾將台海兩岸的音訊斷絕歸咎於共產黨政權，離台後的這些說法，應可視為錢歌川的內在心聲。

107 學者齊邦媛在〈從灰濛凝重到恣肆揮灑——五十年來的臺灣文學〉中說：「本省作家和隨國民政府來臺的作家所共同面對的是一個斷裂的時代。外省作家占了語文的優勢，成為當年文壇主力。詩人與小說家中許多是隨軍隊來的青少年，戰爭和離散是他們僅有的故事記憶，也成了他們日後寫作的主要題材。家國之痛與身世之悲全灌注在被稱為『反共懷鄉文學』中，近五年來本土觀點所寫論著和大陸研究臺灣文學著作將它稱為『戰鬥文學』甚多政治性嘲諷。」引自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10），頁15。

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反攻復國」為終極目標不同；錢歌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並非針對中國共產黨政權進行意識形態的對抗，反而是以藉由提供台灣當局龐大經濟與軍事援助為後盾，對台肆行文化侵略的美國作為批判的對象。在戒嚴時期反共文學當道之際，不評論台灣當局的施政得失，或許是白色恐怖壓力下的自我約束；不附和官方文藝政策的書寫策略，則可能是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抵抗。

從自願移居到被迫滯留台灣17年的經歷來看，錢歌川無疑是改朝換代（台灣由日本殖民轉為中國接收）與戰爭（國共內戰）影響下，因緣際會在台灣崛起的文學世代。錢歌川原擬暫時遷台，卻因時勢所迫不得定居下來的經歷，不但是眾多同輩作家的共同經驗，其筆下遙想大陸親友而不得歸去的煩悶與鄉愁，也成為五〇年代以來台灣文學中常見的創作主題。目前學界討論大陸遷台作家及其懷鄉文學時，多將之置於台籍作家本土書寫的對立面。¹⁰⁸ 筆者認為這樣的二分法有其盲點。「外省族群」既為台灣的四大族群之一，外省族群的歷史經驗無可否認也是台灣人記憶的一種。懷念大陸原鄉的文學寫作，儘管表現的是無法根著於台灣的心理遺憾，卻也相對地標誌出創作當下立足於台灣的物質基礎。¹⁰⁹ 因此外省來台作家的文學創作，理應被視為台灣文學「在地」書寫的某種類型。就此而言，錢歌川的創作或可提供我們一些啟發。

對照錢歌川遷移至台灣的身世經歷，居台以後的文學創作中，既有從外

108 例如已故的葉石濤評論懷鄉文學時說它，「壓根兒跟此地民眾扯不上關係」，並認為「儘管臺灣民眾毫無困難和阻礙地接受懷鄉文學的那濃厚鄉愁，但是這和本地民眾現實上的困苦生活脫節，讀起來好像是別的國度裡的風花雪月了。」引自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02），頁89。新一代研究者也有極為類似的見解，例如柯品文在〈戰後台灣散文家國意識之記憶、拼貼與重構〉中說：「二戰後，中國國民黨於1949年播遷來台與戒嚴初期，台灣文壇所進行的是與台灣本土議題不甚相關的反共文學與外省籍作家的懷舊文學」。見於《高醫通識教育學報》3期（2008.12），頁175。另外，王德威的後遺民論述對中國原鄉的凝視，其實也是對立於本土論述而展開。詳情可參考劉智濤〈當王德威遇上原住民——試論王德威後遺民論述〉中的質疑，以及有關台灣主體建構與故國意識間的辯證。見於《台灣文學研究學報》6期（2008.04），頁157-191。

109 張寧的研究認為「雖然追溯原鄉的人經歷的文化時空的質天差地別，但共同的一點是取他鄉的經驗歷史回看故土的一切，從而用選擇性的符碼構築原鄉的意象」。邱珮萱據此闡述指出：「沒有他鄉經驗就沒有所謂的原鄉追尋，也只有現實時空下遙思追憶已失的故土時，原鄉敘述才得以綿密地開展」。見張寧，〈尋根一族與原鄉主題的變形——莫言、韓少功、劉恆的小說〉，《中外文學》18卷8期（1990.01），頁155；邱珮萱，《戰後臺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6.10），頁261。

來移居者的眼光，觀察記錄台灣當地風土民情與社會民生的隨筆，也有自比為「遺民」的鄉愁文學，抒發身在異鄉台灣而心繫中國原鄉的悽楚與惆悵。錢歌川被迫定居台灣而進行的在地書寫，及所自然流露出關於那個離亂時代的感覺與記憶，不但是大陸遷台作家文學中的某種典型，也在在表現出戰後台灣政治環境與社會文化的變遷，具體說明同一位作家筆下，描繪台灣生活現實與眷念大陸原鄉兩種內涵可兼而有之，也因此這兩種文學精神雖有差異，但絕非互相對立。除此之外，錢歌川移居新加坡之際，轉而稱台灣為「故國」，以及移民美國後回頭凝望時，逐漸萌發出以台灣為「第二故鄉」的認同，顯示隨著作家本人在世界地理座標上的變動，在他內心裡的台灣也有位移流動的可能。錢歌川作品所映照大陸來台作家文學多元而複雜的面向，在台灣文學史上理應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1）。
- 李豐楙等編著，《中國現代散文選析2》（台北：長安出版社，1987.09再版）。
- 味橄，《淡煙疏雨集》（台北：晨光出版社，1952.10）。
- ，《游絲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08）。
- 邱珮萱，《戰後臺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10）。
-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一九五〇—一九八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06）。
- 黃得時編，《板橋詩苑別集》（台北：薇閣詩社，1949.12）。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02）。
- 葉芸芸主編，《證言2·28》（台北：人間出版社，1993.02新校增訂第二版）。
-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10）。
- 黎湘萍，《文學台灣——台灣知識者的文學敘事與理論想像（增訂版）》（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04）。
- 錢歌川，《三臺遊賞錄》（高雄：大眾書局，1953.06）。
- ，《蟲燈纏夢錄》（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05）。
- ，《蟲燈纏夢錄》（台北：雲天出版社，1970.12）。
- ，《竹頭木屑集》（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56.05）。
- ，《狂瞽集》（台北：文星書店，1964.01）。
- ，《搔癢的樂趣》（台北：文星書店，1964.06）。
- ，《罕可集》（台北：文星書店，1965.01）。
- ，《偷閒絮語》（台北：仙人掌出版社，1970.11）。
- ，《秋風吹夢錄》（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76.03）。
- ，《錢歌川散文集——瀛壖消閒錄》（台北：四季出版事業公司，1981.10）。
- ，《浪迹烟波錄——錢歌川雜文集》（中國北京：友誼出版公司，1983.09）。
- ，《楚雲滄海集》（中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09）。
- ，《雲容水態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6.12）。
- ，《苦瓜散人自傳》（香港：香江出版社，1986.12）。

- ，〈湖山入興樓詩〉（作者自刊，出版時地不詳）。
- ，〈錢歌川文集〉第四卷（中國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02）。
- 作，劉慧英編選，〈錢歌川代表作·巴山夜雨〉（中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01北京第二次印刷）。
- Benedict Anderson（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3.11初版八刷）。
- Mike Crang原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8.09初版五刷）。

二、期刊論文

- 不著撰人，〈編後語〉，《新希望週刊》12期（1949.05.14），頁15。
- 王嵩，〈如嚼橄欖 深有餘味——錢歌川散文風格論〉，《閩江學院學報》2014年06期，頁72-77。
- 田青，〈漫談錢歌川的散文〉，《語文學刊》1996年06期，頁25-26。
- 杜學忠，〈錢歌川散文創作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4年01期，頁203-213。
- 味橄，〈入臺記〉，《臺灣文化》2卷6期（1947.09），頁6-9。
- ，〈談「無所謂」〉，《臺旅月刊》創刊號（1949.02），頁27。
- ，〈旅臺漫筆（一）〉，《新希望週刊》12期（1949.05.14），頁6-7。
- ，〈大三元——現階段的教授生活〉，《新希望週刊》13期（1949.05.21），頁6。
- ，〈鄭成功是怎樣成功的？〉，《新希望週刊》14期（1949.05.28），頁6。
- ，〈蚊蚋的樂園〉，《新希望週刊》15期（1949.06.04），頁4。
- ，〈南臺雙泉試浴記〉，《新希望週刊》18期（1949.06.25），頁5-6。
- ，〈月夜觀曇花記〉，《臺旅月刊》1卷6期（1949.09），頁14-15。
- 柯品文，〈戰後台灣散文家國意識之記憶、拼貼與重構〉，《高醫通識教育學報》3期（2008.12），頁173-203。
- 殷志鵬，〈錢歌川遺詩中的人品因素〉，《香港文學》76期「紀念錢歌川先生特輯」（1991.04），頁23-24。
- 張寧，〈尋根一族與原鄉主題的變形——莫言、韓少功、劉恆的小說〉，《中外文學》18卷8期（1990.01），頁155-166。

- 莫渝，〈不曾輟筆的錢歌川〉，《文訊》62期（1990.12），頁120-121。
- 陳子善，〈錢歌川和他的散文〉，《書城》1995年04期，頁33-34。
- 陳嘯，〈“偷閒”絮語——錢歌川散文論〉，《名作欣賞》2012年29期，頁120-123。
- 趙志邦，〈記錢歌川教授〉，《傳記文學》58卷1期（1991.01），頁59-62。
-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究》31卷1期（2001.03），頁81-127。
- 劉克襄，〈錢歌川的美麗錯誤〉，《印刻文學生活誌》92期（2011.04），頁130-132。
- 劉智濬，〈當王德威遇上原住民——試論王德威後遺民論述〉，《台灣文學研究學報》6期（2008.04），頁157-191。
- 編者，〈作者介紹〉，《臺旅月刊》創刊號（1949.02），頁47。
-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9期（2006.09），頁145-181。
- 錢歌川譯歌，Friedrich Silcher曲，〈羅勒萊的歌〉，《臺灣之聲》民國36年三月號（1947.03），頁12-13。
- 錢歌川，〈日月潭探幽〉，《新希望週刊》30期（1949.09.17），頁12-13。
- ，〈烏來觀瀑記〉，《暢流》1卷1期（1950.02），頁8-9。
- ，〈雨遊阿里山〉，《暢流》1卷11期（1950.07），頁11-12。

三、報紙文章

- 歌雷，〈總論臺灣新文學運動〉，《臺灣新生報·橋》129期「編者·作者·讀者」欄，1948.06.21。
- 錢歌川，〈臺北邨居〉，《公論報·日月潭》170期，1948.05.29。
- ，〈邨居雜詠〉，《公論報·日月潭》177期，1948.06.12。

四、電子媒體

- 余愛華，〈錢歌川〉詞條，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辭典資料庫檢索系統」（來源：<http://tld.nml.gov.tw/opencms/dictionary/Dictionary01819.html?keywords=%e9%8c%a2%e6%ad%8c%e5%b7%9d>，2014.06.10）。